



湯炳正 著

語言之起源
(增補本)

語言之起源

山西省姚奠中國語教育基金會
學術研究書系

山西出版
三晉出版社

湯炳正 著

語言之起源

(增補本)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
● 三晉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語言之起源(增補本)/湯炳正著.--太原:三晉出版社,2015.7

ISBN 978-7-5457-1129-5

I. ①語… II. ①湯… III. ①漢語史-文集
IV. ①H1-09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5)第158242號

語言之起源(增補本)

著者:湯炳正

輯校:湯序波

責任編輯:落馥香

責任印制:李佳音

出版者:山西出版傳媒集團·三晉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址:太原市建設南路21號

郵編:030012

電話:0351-4922268(發行中心)

0351-4956036(綜合辦)

0351-4922203(印製部)

E-mail: sj@sxpmg.com

網址: <http://www.sjcbbs.cn>

經銷者:新華書店

承印者:山西臣功印刷包裝有限公司

開本:787mm×960mm 1/16

印張:23

字數:480千字

版次:2015年7月第1版

印次: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書號:ISBN 978-7-5457-1129-5

定價:69.00圓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湯炳正

(1910—1998) 先生，字景麟，室名淵研樓，山東榮成石島張家村人。文字學家、語言學家、楚辭學家。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曾受業於太炎先生，被許為“承繼絕學惟一有望之人”，又有“章門孔廣森”之譽。章先生既沒，先生被推舉為弟子中的唯一代表在追悼會上表態，要“發揚光大先師的學術傳統”，並受聘為“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會”文字聲韻訓詁之學的主講教席，后又任國立貴州大學、國立貴陽師範學院、私立川北文學院教授。1950年7月以還，歷任公立川北大學、四川師範大學教授。重要著作有《語言之起源》《屈賦新探》《楚辭類稿》。

先生曾任“中國屈原學會”首任會長，以“《楚辭》學”名世，是“二十世紀最傑出的楚辭學家”之一。其實，“小學”乃先生畢生用力最勤之學科，其這方面的“戛戛獨造，成就並不在其‘《楚辭》學’之下”。如其語言起源說，“為世人揭開了人類語言起源之謎”，“其重大理論意義當能激發起世人之共識”，是今天解決這項世界性難題的“三大可行路徑”之一；其關於語言與文字關係之研究，“當時堪稱獨領風騷，迄今亦罕有出其右者”。

本書即其“小學”研究成果之薈萃。



作者照片



1986年湯炳正（左一）、姚奠中（左二）、李希泌（左三）、章念馳（後排）等在章太炎先生墓前



湯炳正（後排右一）1988年7月在其三哥湯浩正（後排左一）家，與兒子湯世洪、兒媳張世雲合影

出版說明

湯炳正先生是著名民主革命家、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的七名研究生之一，早年親炙大師，得章門治學之妙。嗣後在語言文字學及楚辭學方面多所創獲，嘉惠學林。而《語言之起源》即先生之代表作。是書曾於1990年由臺灣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然海峽所阻，受眾不廣。幸先生之哲孫湯序波教授能承先人之大志，續家學于不絕，精補篇目，逐字校錄，成此增補本。又得山西省姚奠中國學教育基金會資助，使此大作以嶄新之面貌問世。特別應予說明者，姚奠中先生與湯炳正先生同於1935年考入章門，抗戰結束後，經姚先生介紹，湯先生到國立貴陽師範學院任教，與姚先生又為同事。新中國成立後，歷經各種運動、十年浩劫，兩位先生雖天各一方，却從未中斷聯繫，並以繼承章氏國學為己任，則此書面世之前因後果，又賡續了一段國學傳承之佳話，兩位先生九泉有靈，定會會心一笑吧！

湯先生原書用繁體寫就，且多係舊稿，部分文字與當代規範不一致，為保原貌，除個別訛誤之外，一仍其舊，專此說明。

三晉出版社

2015年5月17日

序

力 之

辛卯歲，序波兄增補其先大父景麟先生《語言之起源》成，即寄來打印稿囑余序之。然略為瞭解景麟先生之學術者，誰人不知“小學”迺其看家本領，而是書中之尤為秀出者，就“立”在〔俄〕瓦·康定斯基《論藝術的精神》所說的三角形之頂端處。因之，秋果再熟，而余無日不在惶恐中——“綆短者不可以汲深”。況這“短”“深”之別猶雲泥也，故深知雖勉力為之，仍無異於“佛頭著糞”。然大有古君子風之序波兄，竟不肯收回“成命”。好在余於研讀景麟先生大著的過程中，終於“醒悟”了：無論如何，“佛頭”自是“佛頭”；蒙幸如此，“讓人說去”又何妨。

我們知道，景麟先生以“《楚辭》學”鳴，乃二十世紀該領域真正之大家。其實，遠不止此，景麟先生“小學”方面之戛戛獨造，成就並不在其“《楚辭》學”之下。可以說，這二者迺其學術的兩座齊高之主峰（祇是後者大半仍“埋”於“霧中”罷了）。筆者曾云：

先生之著作如《屈賦新探》《語言之起源》與《楚辭類稿》，其所論均莫不文獻支撐堅，邏輯穿透力強，新見迭出，精義紛呈，或發前賢之所未發，或至時彥之所弗屆，或甚具學術生長點，令海內外學人為之傾倒。先生的學術研究，乃智慧與知識之有機結合的典範。以知識支撐智慧，用智慧提升知識，故先生之破解一個個學術難題，不僅得益於其淵深之國學根柢，亦賴其“破解”之大智慧。換言之，先生的論著，不管是有關語言文字學的，還是“《楚

辭》學”的，無不極具方法論方面之重要意義，而此啟迪於學界者尤多。至於先生學問所呈現出的氣象，則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說，實根基於道德之高尚。（《湯炳正傳序》）

當然，這是就總體情形說的，析而言之，則先生有關語言之起源和文字與語言之關係方面至為重要的成果，由於種種原因，並未得到學術界應有的重視。

是書正編及附錄共收景麟先生三十二文，前者主要為論文，後者則半為序跋等。是多為極佳之學術精品。其中，正編的二十文，大致可分關於語言之起源、文字與語言的關係和有關古音韻及文字方面的。景麟先生自序是書初版云：“這本集子”的文章“都是探討語言文字的。而對語音與語義的關係，乃至語言起源等問題，尤三致意焉。”而由於筆者無力為序，就祇好以讀書心得之式代之。這裏，主要是想着重說說先生是書在“語言之起源”與“文字與語言之關係”這兩方面的突出貢獻。而由於在先生那裏，“手勢說”無論是對考察“語言之起源”還是對考察“文字與語言之關係”，均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且由是使兩者各具互證之功能，故不得不“節外生枝”而辨析否定“手勢說”之說能否成立。然後，再略說是書有關古音韻及文字方面之文——所以如此，迺因這與上述兩類文不同，不必置之於“廣久”之域中加以考察，並將之與相關之文比觀，亦不難明其價值（《〈成均圖〉與太炎先生對音學理論的建樹》略為例外）。西哲有言：“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馬積高先生說：“學術本公器，即使有大才，離開常見的基本事實和已有的研究成果也不能前進一步。”（《〈清代學術的變遷與文學〉前言》）故欲寫出幾句大致恰當的話，淺薄如余者，祇得在“大背景”中下笨工夫——作一番梳理，並將先生之論與相關名家之說略加比觀。不如此，便難以客觀地說明景麟先生是書在學術上實實在在之重要貢獻，尤其是先生在語言之起源、文字與語言的關係方面之高標。然這樣一來，自然要“浪費”多多，此迺“小”而不得不為“大”者之所難免也。不過，在此“浪費”中卻可避免諸如某些名家之自說自話（如高名凱先生在其出版於1963年的《語言論》一書中已指出：“一般語言的起源問題包含兩個方面的問題，即‘語言是在什麼條件下產生的’，‘語言是從什麼事物發展而來的’。”而恩格斯的“勞動說”針對的是前

者；手勢說、摹聲說、感歎說之類，則是針對後者“而作的回答”〔參石安石《重印〈語言論〉序》〕。然學者或不知“別”，或重復高說而“後來轉粗”與“空對空”，等等。

一、關於語言的起源問題

語言之起源問題，這是西方學人長期關注的熱點。在西方，很早就有人對這一問題進行過探索，在某些神話傳說與宗教的文獻中，認為語言是神所賜，典型的如《聖經·舊約·創世紀》中關於上帝造亞當與使亞當為萬物取名的描述。此即所謂之“神授說”。直到18世紀，是說仍然主導着大多數學者之思維。18世紀與19世紀，歐洲學者尤為喜歡就這一問題發表意見與進行討論，出現過種種的假說與推想。此間及略後的如赫爾德（1744—1803）之“摹聲說”、繆勒（1823—1900）之“本能論”、葉斯柏森（1860—1943）之“唱歌說”、格雷（1875—1955）之“感歎說”、諾瓦雷（1847—1889）之“勞動喊聲說”、帕傑特（1869—1955）之“達-達說”等等（這些說法有的來源甚早。如“摹聲說”與“感歎說”分別源於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和斯多葛派與伊壁鳩魯派）。然自19世紀始，歐洲的語言學家往往從實證主義之立場出發，拒絕討論有關語言起源的問題。在這方面，法國語言學家表現尤為突出：“1866年巴黎語言協會宣布這項研究是非法的；1901年，再次強調這項法律的有效性。”（〔美〕鮑齡格《語言要略》，1975年第2版，方立等譯，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3年版，第466頁）而“當時的巴黎語言學會是那個時代最有聲望的一個科學學會”（約翰·萊昂斯《語言的起源》，費比恩編、王鳴陽譯，第185頁，華夏出版社2006年版）。在這樣的背景下，西方現代語言學之父——瑞士語言學家費爾迪南·德·索緒爾（1857—1913）於二十世紀初說：

事實上任何社會，現在或過去，都祇知道語言是從前代繼承來的產物而照樣加以接受。因此，語言起源的問題並不像人們一般認為的那麼

重要。它甚至不是一個值得提出的問題。語言學的唯一真正的對象是一種已經構成的語言的正常的、有規律的生命。(《普通語言學教程》第108頁，高名凱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

法國著名語言學家約瑟夫·房德裏耶斯(1875—1960)在其撰成於1914年的《語言》一書中亦云：

說語言的起源問題不是語言學方面的問題，總是會使人感到驚訝。但這確實是一句真話。近百年來，大多數論述語言起源的作家沒有注意到這一點，祇能走入歧途。……認為通過現存語言的比較可以重建出一種原始語言，這是幻想。(第8頁，岑麒祥、葉蜚聲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

不僅如此，直到20世紀60年代，“還偶爾聽到這種觀點：‘對遠古時期語言起源的猜測是項不體面的活動。’”(鮑齡格《語言要略》，第466頁)然而，這正如景麟先生所說的，“未免因噎廢食，殊失學術研究應有之態度”(《語言起源之商榷》)。略後，前蘇聯學者A. C. 契科巴瓦亦認為巴黎語言協會1866年的這一做法不妥，他說：“這樣對語言起源問題的態度在方法上是錯誤的，因為語言學沒有權力拒絕研究語言起源的問題，正如生物學不能拒絕生命起源問題一樣。”(A. C. 契科巴瓦著、周嘉桂譯《語言學概論》第一編〔上冊〕，第115~116頁，高等教育出版社1954年版)又後，前蘇聯學者B. И. Агаев在發表於1970年之文中同樣如是觀，云：“科學的良心不能容忍這種人為的障礙。”(《論意識和語言的起源》，《國外語言學》1980.1)當然，我們知道：隨着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自20世紀30年代始，自然科學領域中的學者們對語言起源問題逐漸地產生了興趣。而比之此前的哲學家、語言學家與人文方面其他學科之學者，他們用更為科學的手段來研究這一問題，取得了不少使人眼睛一亮之初步成就(或可稱之為“外圍”成果)。問題是，此非在語言學界。就西方語言學界言，“這種興趣的重新點燃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約翰·萊昂斯《語言的起源》第197頁)。其後，“這種興

趣”逐漸旺起：美國紐約州科學院於1976年發起主持了一次關於“語言和語音的起源和演變”的學術研討會；1983年一個研究語言起源與演化之國際性學會——“語言起源學會（LOS）”在加拿大溫哥華成立，而該學會每年在西歐或北美舉行一次會議。荷蘭（“語言起源學會”所在地）學者克裏斯·布斯克斯在其撰於本世紀初的《進化思維：達爾文對我們世界觀的影響》一書中說：“儘管最近幾十年來在這方面已經取得了顯著的進展，但是語言的起源，卻依舊是一個未解之謎。”（徐紀貴譯，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頁）而美國學者威廉·W·哈維蘭在其出版於本世紀初的《文化人類學》（第10版）中說：雖然“我們依然不能證明人類語言是怎樣產生和什麼時候起源的，但與過去的情況相比，我們的推測較少盲目性”（瞿鐵鵬、張鈺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頁）。據此，我們大略可知“這種興趣的重新點燃”以來，歐美這一研究之大概。

因之，就本研究領域上世紀前半葉的情形言，正如景麟先生1948年所說：“英國的語言學家威爾遜教授的《語言產生之奇蹟》，在上述的學術空氣之下，竟能毅然以探討語源為己任，其精神殊為可嘉。”（《語言起源之商榷》）另一方面，我國學者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則是中國現代理論語言學的開始。進入20世紀後，“語言的起源”成了現代語言學家甚感興趣的問題之一（19世紀末，論及這方面的文字少而簡單，如盧贛章發表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正月的《萬國公報》第84冊上的《變通推原》第四章《述亞洲東北創切音新字振興文教為強盛之原》之“試揭語言文字之緣起而申明之”云云，即如此）。章太炎（《語言緣起說》，1907年）、劉師培（《正名隅論》，1906年）、胡以魯（《國語學草創》，成書於1912年）、樂炳嗣（《語言學大意》，中華書局1923年）、沈步洲（《言語學概論》，商務印書館1931年）、張世祿（《語言學原理》，商務印書館1931年；《語言學概論》，中華書局1934年）、張維思（《中國語言之起源及其特性》）等先生對此均發表過意見。這與當時西方對語言的起源研究之“冷”甚異其趣，仿若給人這邊“風光獨好”之感。當然，此中更多的祇是介紹西方相關之觀點。

太炎先生《語言緣起說》，蓋我國語言學史上首篇關於語言起源問題之專論。（姜義華先生說：“在中國，文字音韻學在清代漢學家那裏曾經得到光輝

的發展，然而，關於語言起源問題，則屬於空白。章太炎在近代中國首次專門研究了這個問題。在《國學講習會略說》〔今案：1906年9月出版〕中，他以《論語言文字之學》為題，對語言的起源作了分析；後來，他又將其中有關部分單獨抽出，冠以《語言緣起說》題目，收入《國故論衡》中。〔氏著《章太炎思想研究》第458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又，劉師培有《正名隅論》，然正如其開篇所說：“光漢治小學，粗有撰述，近復探求中國文字之起源，作《正名隅論》一編……”）姚小平先生說其“未受現代中國語言學史家足夠的重視”（氏著《17—19世紀的德國語言學與中國語言學》第243頁，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1年版），的然。不過，太炎先生此重要之文的“物之得名，大都由於觸受”（章太炎著，龐俊、郭誠永疏證《國故論衡疏證》，第169頁，中華書局2008年版）云云，更多的是說字之緣起，而非語言之起源。

同時或略後，太炎先生的早期弟子胡以魯（1888—1917）在北京大學開設語言學課程，其所撰《國語學草創》乃中國現代理論語言學誕生的一個標誌。在此教材中，胡氏以全書四分之一強的篇幅討論語言之起源問題（見第一編《說國語緣起》）。王希傑先生說是書“介紹了西方的語言起源學說，也繼承中國傳統語言學說，充分利用中國的材料，來探索語言的起源，特別是探索了中國語言（或者說是漢語）的起源問題”（《略說胡以魯對中國理論語言學的貢獻》，《淮北煤炭師範學院學報》2003.6）；趙振鐸先生說是書“吸收了古希臘伊壁鳩魯學派所提出的語言起源的感歎論和斯多噶學派所提出的語言起源摹聲論，提出語言的起源當分為發聲時期與摹聲時期兩個階段”，而“這和單純的講感歎論和摹聲論不同”（氏著《中國語言學史》第470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這均是符合實際的。

其後，在上述樂、沈、張等先生之書中的有關語言起源方面的內容，主要的乃引介西方有關語言起源的觀點；張維思先生之文等，亦然。前者如沈先生《言語學概論》第五章（《言語之起源》）首段之“言語之來源，頗有足資研究者。仍歲以來，諸家聚訟，迄無定論。吾等欲加判斷，勢難免於偏徇。茲姑采諾伊內（Noire）之意，並列諸說，稍加評駁，以為研究之資料”；張先生之“言語在人類史上怎樣產生，怎樣發展成功呢？對於這個問題，從來有

許多種學說，當中最重要，就是‘摹聲說’、‘嘆詞說’和‘身勢進化說’三種……現今對於言語起源問題，以身勢進化說最為一般人所信認。帕澤特 (Richard Paget)、貝克脫拉夫 (Bekhterev)、卡勒脫 (Charels Callet) 以及那些接近溫德氏 (Wundt) 學派的人都主張這種學說” (張世祿《言語學簡述》[就《語言學原理》的相關內容縮寫]，《新中華》雜誌第2卷第19期 [1934年10月]，第121頁)；“語言本來是隨附於身勢表現的自然發音，逐漸演化而為民族社會上一種主要的交通工具” (《語言學概論》第35頁)。後者如前面提到的《中國語言之起源及其特性》一文說：“中國文化既有數千年之演變，而語言亦自有一大部變遷史……但無論其變遷怎樣，其類別又怎樣，卻有着永不湮滅的痕迹顯露着：就是原始的語言的發生，是起於摹擬、驚歎、勞動三條路子。” (《學思》第2卷第2期 [1942年]，第366頁) 今人何九盈先生說：“……西方的感歎說和摹聲說影響很大。” (氏著《中國現代語言學史》第75頁，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 就20世紀上半葉西方有關語言起源諸說對我國學界之影響言，綜觀章太炎《語言緣起說》、胡以魯《國語學草創》、劉師培《正名隅論》、楊樹達《高等國文法》(參該書第一章之“乙”)、沈兼士《文字形義學》(參其“上篇”之《文字之起原及其形式和作用》) 等等，斯可謂得其大者。至於持“身勢進化說”(與“手勢說”同)之“‘摹聲說’和‘嘆詞說’兩種解答，似乎各具有一方面的理由”(《語言學概論》第29頁)，而均“不足以解釋語言本身的性質和語言產生的由來”(參前書，第31~32頁)云云，亦甚近是。

問題是，就20世紀前50年之相關研究言，不僅太炎先生的《語言緣起說》“未受現代中國語言學史家足夠的重視”，其高足景麟先生的《語言起源之商榷》《原“名”》(當然，我們注意到是文晚至1990年纔問世) 等有關語言起源之至為重要的研究成果更是如此，遠未得到應有的關注。而從語言起源的角度看，後者更為純粹、更為獨至。換言之，就語言起源這一研究領域之原創性貢獻言，目力所及，其時無出景麟先生說之右者。

1948年，景麟先生應黃源先生之請，為其翻譯之英國學者威爾遜新近出版的《語言產生之奇跡》一書作序——此即著名的《語言起源之商榷：黃譯威爾遜〈語言產生之奇跡〉序》一文(發表於次年之國立貴陽師範學院的

《教育學術》4、5合刊號上）。威氏是書撰於“二戰”前的20世紀30年代中（黃源譯本，花溪圖書社1948年出版），分《歷史之回顧》與《新興之發現》兩編，而後者亦僅第九章（《語言》）與第十章（《語言及時空之自然藝術》）論及語言產生的問題。即先生“序文”所說的“今尋誦其全書，前編為歷史之回顧，亦即追述前人對此問題之解答；後編始述其個人之意見。但其意見的內容，則什九為探討人類普通之進化問題，其涉及語言者，僅九、十兩章”，而“就此兩章言之，又純係依‘時’‘空’觀念，說明人類進化之途軌，及語言產生之過程。惟其所言者，乃語言產生過程之一般原則與現象，亦即未能探及語言起源之核心問題。即偶一及此，亦僅以抽象之語詞，作膚淺之解答，未能深入堂奧，作腠理之剖析。作者自謂，乃‘對語言之構造及起源，予以哲學之新解釋’，又謂‘余希能以哲學概念，說明語言之性質’。不過根據吾人之觀察，則著者除運用哲學概念之外，更雜以文學之描述”。此可謂鞭辟入裏，一語中的。

在該書的第九章與第十章中，威氏還分別說：

何以取音為語言之原料而不取手勢，以邏輯言此猶為次要之事，而基本之邏輯，吾人採用為語言之原質，將世界轉入思維，乃時間之過程。經過思維之邏輯，而聲音乃時間之表現，故思維與述說，不過時間運動之內向與外向之二面觀而已。近代心理學家更信思維與語言乃不可分之聯繫，後者即前者之外向表現耳。此又可於目的上有更遠之證據，即人之生理構造，先於真實語言之出現，原始人對此二者均有因果之聯繫，當一有所感，即以聲音代語言而出，即在沉靜之思維，吾人亦有語言發出，不過為不可聞及未發諸唇耳。吾人猶可謂思想所以與音帶有密切之連繫者，蓋因長久關連之故，但事實上似有一更基本之連鎖。（《語言產生之奇跡》，第112頁）

有感覺之音素，固作為音節語言之基質，當語言自唇發出時，彼亦同時流出，若音樂者即其實例。然語言與其餘四種藝術，根本不同，當語言一出諸口，其被習慣所分化之字義即現。故當思維觀解世界時，首

先乃以純粹之音出現，而同時又為習慣化之音，表現其思維中之時空構造。（《語言產生之奇跡》，第118頁）

顯而易見，此實亦未達一間。威氏於此，可謂合“系統的問題”於“發生學的問題”而一之。用景麟先生《語言起源之商榷》的話來說，即同樣是以“語言產生以後的現象”來闡述“語言起源”本身之問題。——“習慣化”與“何以取音為語言之原料而不取手勢”說，均祇能用以說明語言產生以後的現象而非語言產生時之情形。另外，例以摩爾根“人類之發出聲音，最初是用來輔助手勢的”與景麟先生“先民為‘輔助’手勢之所不逮，於是昏夜之際表達意志與說明事物，即不得不借助於口音”說（參後），威氏之“思維與述說，不過時間運動之內向與外向之二面觀而已”云云亦有所未照。換言之，此仍如景麟先生所說的，“未能深入堂奧，作腠理之剖析”。

不過，在筆者看來，這與其說是威氏解答或所述之“膚淺”，倒不如說是景麟先生目光的犀利與其見解之深刻，遠高出了時人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水平。以此比觀是書卷首蕭伯納所撰的長序（雖然是序所說與語言起源無太多的關係，然可以例之）與略前的福爾（J. R. Firth）之《語言學通論》（其第一章為《語言的起源》，張世祿、藍文海譯，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及當時相關之論著，便一清二楚。具體而言，威氏之“何以一僅能取於耳之時間，又可轉之使表空間之物體？二者乃全然不同者，蓋空間僅可以取諸眼者也”（《語言產生之奇跡》第113頁）云云，正如先生是“序”所說的，確是“極其精彩的有關語言起源的核心問題”。然而，“著者對此極端重要之核心問題，竟以語言產生之後的‘習慣化’了之；而對於語言產生之初，為什麼‘其音取於耳’，竟會‘印象存於腦’，則避而不談。……‘習慣化’的結論，實乃近代中外多數語言學家的共同主張，並非威爾遜氏一人之創見。而他的獨特之處，乃在於從哲學角度，提出了語音怎樣由表示‘時間的’轉化而為表示‘空間的’這一命題。但是，由於著者這一命題的本身即缺乏科學根據，無怪其‘作繭自縛’，竟成了他無法突破的難關。其實，作者如果對人類的語音，能作‘物理的’‘生理的’‘心理的’科學研討，就不難發現，語音本身除了‘時間’的要素，又何嘗不含有‘空間’的要素。以輔音而言，則有脣、舌、

齒、顎等不同的阻位；又有爆、擦、顫、邊等不同的動態，此非‘空間’的要素而何？以元音而言，則有脣狀的圓扁，舌部的前後，口腔的開合，聲帶的振動等等，此非‘空間’的要素而何？因此，以具有‘空間’要素之語音，表示‘空間’事物之形態，這其間並無不可逾越的鴻溝，也不需要什麼‘時’‘空’之轉化，而是‘時間’與‘空間’的天然統一。威爾遜氏對此之所以難於突破，正由於他對人類所發生的語音，缺乏科學的分析”。先生所說，入木三分。其所“破”者無不中要害；其所“立”者無不說新而堅確——彼時如此，一個甲子過去後之今日依然如此。於此，筆者不期然而然地想起了莊子《養生主》所說“方今之時”的庖丁，其解牛“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而臻於“遊刃有餘”之境；於此，筆者不期然而然地想起了西方現代畫家畢加索的《亞威農少女》，畫家在該畫中成功地將時間“融入”空間，從而使是畫有了“時間”之層次。戴東原（《與是仲明論學書》）與其師江慎修（《〈古韻標準〉例言》）所說之“識斷”，今於斯見其尤善者矣。

先生又說：

與“時”“空”相關的，威爾遜氏又提出語音乃“取諸耳”者，而物態乃“取諸眼”者，為何“取諸耳”之語音能轉化而為“取諸眼”之物態？這是威爾遜氏無法突破的又一難關。但他卻沒有能從“心理學”的角度來攷慮這個問題。在心理學上有所謂“通感”現象。即指人類心理上的“感官相通”或“感覺移借”。人之感覺官能，如視覺、聽覺、觸覺、味覺、嗅覺等，它們之間是能互相溝通的。這種“通感效應”，乃人類共有的心理素質。因此，它們不必借助於習慣，而通過某種“取諸耳”的語音，即可“通感”到某種“取諸眼”的物態，這已經是心理學上的科學結論。故威爾遜氏所提出的這一問題，並非語源學上難於突破的難關。

此與前引先生所說一樣，識卓而斷善。而在琢磨先生治學之所以然時，筆者大略悟出了“做學問，要知道在關鍵處着力，要懂得在‘岔口處’辨方向，且時或得跳出研究對象來考察研究對象”之秘。此可謂得“金針”之所